

##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逆向生长的障碍

胡培兆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了全国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课题。改革实践给我们的经验之一是,摸准认定为希望所在的好事物,因具体操作的思路 and 行为的失当,仍然会旁趋斜出,到不了正位上。出于这个考虑,本文提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逆向生长会遇到的障碍和国家股的特性问题,要说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出路,成败在此一搏。国有企业应分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两类分别进行改制。国家股是特权股,与一般股民的普通股本不存在同股同权同利的问题,若要上市,必然损害广大股民的权益。改制中任何不规范行为的负面影响,最终都将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否对,可以讨论。

我们现在讲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企业制度。因此,从事物本身来说并不是新东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旧中国一些大城市中也曾存在过,只是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才是开创性的,带有新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大体萌芽于 16 世纪,确立于 17 世纪,发展于 18 世纪,成熟于 19 世纪,完善于 20 世纪。它的产生、发展与存在,都是出于集资兴办大型企业的需要。当企业规模超出个人独资经营或超出家属内合资经营的财力时,就必然会出现超越血缘关系在朋友中集资进行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而出现面向社会广泛集资进行合股经营的方式,股份公司就这样逐步形成。在这种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内部,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这种扬弃是仅就资本的存在形式和营运方式的改变而言的,并非说资本的属性改变了。“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sup>①</sup>一个投资者,不论是独资办企业经营,还是买股份把资本交公司经营,都是为了盈利。股份公司是私有者团体的公司。股东买股份把钱交给股份公司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分红派息,二是为了参与股市交易中获得顺价差。因此,股东作为股份资本的私有者,要从个人利益上十分关心股份公司,要过问经营管理,不能把自己的钱任人独断专行随意糟践。于是,伴随股份公司的出现,必然会同时出现法人财产制度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即由一个可以互相制衡的有系统的分级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机构来经营管理。这个法人治理结构自上而下一级监管一级,自下而上一级对一级负责。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275 页。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起来的。为了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组建大规模企业的客观要求,必然会出现通过资本集中途径组建起来的股份公司;为股份公司能履行职责和确保出资者的利益,股份公司必然要实行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生长是顺向的、自然的。

我国目前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背景却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原有的企业制度是国有国营,这种从实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而建立起来的企业制度,愈到后来愈显得没有生命力,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不断下降,直到大面积大额度的亏损,再不能寄希望于修补旧框框维持下去了,非改制无以挽救根本。于是在经历了放权让利、责任制、利改税、承包制之后终于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这种以救活国有企业为目的的特定背景,决定了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增长必然是逆向的:先已存在实力雄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为转变经营机制需要建立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于是需要分散产权、把独资的国有企业化解为股份制企业,从而倒插生长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生长过程正好是相反的。

在既存国有国营企业的基础上作为改革方向去逆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习惯性与错乱性的障碍。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理论障碍。为什么要把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前后说法不一。倡导之初,主要是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职工缺乏主人翁感,影响积极性,以至经营不善,效益不佳。因此需要通过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使产权明晰化,把企业重塑成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的独立微观经济主体。按此说,需要改成股份制的首先应该是那些经营效益差的国有国营企业,吸收职工参股、社会参股,让它们通过股份制的试行取得起死回生的效果与经验,然后逐步向面上推广。可是,进到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这一、二年,说法变了。国有企业要改行股份制的理由已不是为了转换经营机制,搞活企业,而实际是为了集资和能使股票上市的需要。因此不是要把效益差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而是要选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去年年底,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就明确提出:“盈利好、效率高、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大型企业可直接改组为国家控股或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sup>①</sup>。既是盈利好、效率高的国有企业,必定是经营管理得法,机制运行灵活的企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组为股份公司呢?不仅如此,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已成了盈利好、效率高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惠专利。这明显是为了筹集资金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转换经营机制,因为“盈利好、效率高”的企业不存在需要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这就与党中央决定的“实行公司制不是简单更换名称,也不是单纯为了筹集资金,而是着重于转换机制”<sup>②</sup>的精神是不符合的。因为前后理论不一贯到底,忽此忽彼,于是选批哪些国有企业改组股份制企业也就没有一贯的标准,掺进了不少随机性和虚假性。

第二,行为障碍。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转换机制,搞活经营,提高效益。因此,股民和公司的行为都应当为此目的服务。开放股市,证券交易,也是直接或间接为此目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股民与公司的行为逐步背离这个目标,另有所图了。绝大多

① 1993年12月5日贺光辉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3年12月6日《光明日报》第1版的报道。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数股民的心思不是放在有自己股份的公司之经营状况上了,而是专注在股市行情和投机上。成千上万股民的投机冲动组成的巨风,忽而扑向这座城市,忽而又扑向那座城市,那么贪婪急切地高价竞购原始股,唯一的动机就是追逐炒股的暴利上,根本无须过问和关心公司是否有盈利分红派息,股价涨落与公司经营状况也毫不搭界。与之相联系,有些企业的行为也上了黑道。某些亏损企业,乘机利用股民盲目的购股炒股热,造假帐,冒充是“盈利好,效率高”的企业,设计陷阱,从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报批等方面,上下找后门通关卡,改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股金,骗进巨款,大耍股民。事后股民惊呼上当,但也无可奈何了。

第三,故态障碍。表现在一方面,已改组成股份公司的企业,相当大一部分至今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既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当然也就没有正式选举产生过董事会。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一般都是改组前的原班人马,至多也是小范围内的形式选举。实际上只是简单更换名称而已,并没有改变管理体制,也没有转换机制,徒有形式而已。另一方面,从不分红派息,不向股民作年度报告,也不公开帐目,不公布财务年度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心目中根本没有股民权益。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广大普通股民来说只是闷葫芦一只,只知道总经理、总会计师和部门经理的年薪很高,年终奖金又有数万元,坐奔驰、宝马高级轿车,过神仙一样的生活。股民抱怨,骂这种股份公司是“诈骗公司”,光从股民那里集中来的巨额股本存银行取息一年也有数千万元,年终不给股民分红派息,又无处投诉。有的公司年终用配股充当分红派息,结果股价下跌,这实际是搞“股票膨胀”,比不分红派息更糟。

这三方面的问题极大损害了股份公司的形象,阻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广泛建立和正常发挥其固有的积极作用,必须解决。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根据国有企业的实际盈亏情况确立不同目的,至少分两类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凡真正盈利好、效率高的大中型企业为第一类。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明确规定主要以筹集资金为目的。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类企业经营管理本来就很好,主要矛盾不是转变机制,而是需要增资。增资股票可以上市。原始股可以视企业盈利高低溢价发行,需求旺还可以先发行认购券。不过,若先发行认购券,风险就在认购券的购买上,中签后购买股票已无风险,就不应当是溢价的。购买认购券时已垫付了很高的风险成本,再溢价购买股票,总成本就太高了。过去发行的,一元股成本有高达一二十元以上的。原始股成本就这么高,影响上市交易的需求,会成死股、冷股。销售认购券所得的收益,扣除成本和纳税以后,主要应归股份公司所有。因为这是与股份公司的行为相关的,是发售股票工作的组成部分。象目前一样无偿归其他部门所有,实无合法理由。凡亏损的大中型企业为第二类,改组股份有限公司时,可以明确规定主要以转换机制为目的。这类企业不论是由原有资产净值转变为同额的股本金,还是需要增资的股本金,原始股都不能溢价,1元股1元价,否则没人买。也不能上市交易,待到转换机制后扭亏增盈了,才可申请上市。股民购买这类公司股票的前期风险收益在于两个寄托点上:一是公司扭亏增盈了,股票会增值,且有分红派息收入;二是一旦上市,获利必厚。这样分目的分类地改组股份有限公司,理论上可以分别说通,实践上各类企业不论盈亏都可以同时改组,不至于在只有盈利好、效率高的企业才可以改组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亏损企业弄虚作假冒充盈利企业硬求改组的现象。

第二,凡改组股份公司的企业,应同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不允许只简单更换名称,搞形

式主义。1984年冬提出城市经济改革以来,就把搞活国有企业定为关键性的重点。经过10年的各种试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确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决胜局中的最后一搏,胜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存亡,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的领导、职工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一切按公司法从事,不能以一己之既得利益加以干扰。改组股份公司以后,关键是要落实公司的法人财产制度和建成法人治理结构。说同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是说不允许有一定的筹备时间,包括各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酝酿,章程、决议的起草等所需要的时间,但应当缩短,最迟必须在半年内完成,以免有意拖延和防止可能利用未建成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时间空隙在经济上搞舞弊行为。因为股份公司是原有的国有企业改组的,国家股就必然要处于控股地位,这是必要的。在社会经济风气不太正的现阶段,要期望国家股在其控股的股份公司里显示出执行公司法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在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作出表率,真正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的应有作用,兑现他们的权责利,绝不能以控股之权因袭国营方式。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败,最终决定于国家股权的姿态,而不在于广大的普通股民。成败在此一举,国家股应当负起这个责任。

对国有企业股份化,倡导者一开始就提出国家要控股,使国有资产的主体地位不因此受影响。具体占多大份额,视各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和现状而定。国家控股也是为了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作了这样的决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影响范围。”简言之,国家控股的必要是为了确保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现在理论界讨论国家股能不能、要不要上市问题。有些经济学家和国家体改委有关司的负责人主张国家股也能、也要上市,应当和一般股民的普通股一样可以上市出卖股权,认为只有如此才是名副其实的股份制,才有积极意义,并认为国家股上市不仅可以实现其价值,而且股权转让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相反,实物资产一旦转化为货币资产,对产业调整极为有利,因此只是担心没人能有如此大量的资金来买产权<sup>①</sup>。国务院证券委也是主张国家股可以上市的,只是上市流通尚需一个很长的过程,认为同样作为普通股的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本应做到同股同权、同权同利,但目前上市流通的仅仅是个人股和少量法人股,国家股和大多数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sup>②</sup>。对此,我冒昧表示异议。

第一,我国的国家股不是普通股,而是特股权,不能与一般股民的普通股相提并论。

前面我已说明,我国的股份制企业不是从无到有顺向自然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已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基础上逆向非自然生长起来的。因此,国家股不是国家重新掏钱出资通过市场购买加入股份,而是按控股所需要的比例从原有资产净值中折算过来的,1元就是1股。而一般股民的股份是股民出资从一级市场上购买来的,不是1元1股,而是数元甚至一二十元1股。因此,从一开始,个人股和国家股就不是同股同权的,成本差距悬殊。如果国家股也上市,一方面股市供给量会剧增数倍,价格又会大跌,损害个人股东的利益。另外,国家股以什么价格上

① 参见1994年1月11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的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副司长顾士师的观点。

② 参见1994年2月5日《中国证券报》第1版的报道:《国家股法人股流通尚需时日》。

市?按市价,就是跌到几元1股,国家股还可盈利,可个人股每股就要比原始股损失很多。根本就没有“同股同权、同权同利”可言!如果国家股非要出售不可,只能1元1股平价搭配卖给本公司的股东。这样才体现同股同权同利的原则,不损害股东利益。可是这样一来,主张上市者恐怕就没兴趣了。

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的责任主要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而不是、也不能出资包揽这项工作。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头重脚轻,不是优化增长型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落后,交通能源紧张,而商业、旅游、娱乐业膨胀,发展中国家成了浪费性国家,后果必然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气不正。这种失衡的产业结构是旧计划投资体制的沉淀和改革以后缺乏合理产业政策的导向所造成的。总之,与国家的行为有直接关系。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要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调整产业结构,国家主要责任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并辅以一定的财力予以调控,而不是出资包揽。去年12月上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其中将建设项目分为竞争性投资项目、基础性投资项目和公益性投资项目,确定竞争性投资项目以企业作为基本的投资主体,基本向市场融资;基础性投资项目在加强中央政策性投融资的同时,加重企业和地方投资责任;公益性投资项目主要由政府承担。这是正确的,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国家的投融资重点应放在公益性项目上,少过问或不过问其他投资项目。而且,即使把国家股权出售后可以得到一大笔货币资产,转投到短缺的产业项目中去,也不一定就能取得理想结果。更大的可能是重蹈覆辙,管理不善,经营效益差,名为加强瓶颈产业,实是增加一个新的亏损企业。如果公司属产业调整对象,国家可以使其控股公司转产转业,也不必上市,作“金蝉脱壳”状。因此,产业调整不能是国家股上市的理由。

第三,国家股有相应的公司资产,而且可以保值增值,不存在价值不能实现的问题。

主张国家股上市的理由之一,说是国家股不上市价值就不能实现。这是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题外之题,本是不该提出来的。国有企业要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规定国家要控股,目的是为了救活企业,提高经营效益和效率。若达到这个目的,国家股资产不仅能保值,还能增值,还要实现什么价值呢?把公司经营好,才是国家股实现价值的最好办法。如果国家股和一般股民的股权一样要在股市上实现其价值,那末应当在一开始设计改组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办法时,就得规定国家和一般股民是平等的投资者,大家都得从市场中来市场中去。假定原有国有企业核定的资产净值是1亿元,就作1亿股的原始股出售,国家与一般股民都以同方式同价格购买。先有同权,才后有同利。

总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逆向生长的背景和特点,会遇到不规范的人为障碍,应当重视这个负面研究,努力予以消除,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开辟道路。

(责任编辑:林立)